

目 录

许昌正义茶庄的前前后后·····	郭荫青 (1)
李文甫烈士传略·····	沈世昌整理 (6)
关于郑发找蒋介石认亲的前前后后 ——蒋介石家世传闻调查记·····	李耕五 (11)
吕公良事略·····	徐开伟 (63)
我所知道的《许都日报》社·····	关允楨 (66)
“双葫芦”剪刀展翅海外·····	张堂轮李全顺等整理 (69)
许昌官绅徐立吾·····	徐开伟 (71)
“霸王鞭”在许昌开花结果·····	魏永太口述 张堂轮整理 (74)

许昌正义茶庄的前前后后

郭荫青

一九二六年秋，我从河北省威县赵村镇去到开封，经表兄介绍到古楼街义利成茶庄学生意。先学作坊加工拼制茶叶近四年，后作出纳会计四年余。开封义利成下设三个分号，许昌是义利成分号之一。因生意萧条，连年亏损，几乎面临倒闭。一九三四年东家们分家，许昌义利成分归王仙洲经营。当时许昌义利成欠外债款一万余元，除还帐外，已所剩无几，王仙洲感到自己无能力经营，恭手聘请张廉轩任经理，我担任付经理（我和张是师兄弟，当时我在开封义利成作会计工作）。一九三五年冬，在许昌的东、夥签订正式合同，连同王仙洲在周口独自经营的王正大茶庄归为许昌义利成分号，资金定为一千元（实是空头），合同规定利润分成各半，但经理听赚不听赔，並定两年为一帐期（即分红）。

许昌义利成独立经营以后，因我们都比较年轻，张三十岁，我二十四岁，对于经营管理尚缺乏经验，应付当时局面感到吃力。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形势，我们调整了人员，制定了贤能者重用，不徇私情，不准私自向外担保和私自挪用公款，违犯者出号等赏罚分明的规章制度。首先打破过去那种只从开封总号拨调货源的被动局面，开辟了一些新的进货渠道。並协商定期承付货款，原欠外货款往来家对义利成前途不抱希望，迭来商讨，

经双方协商对方愿意折扣延期偿还。同时，我们对外欠帐也采取同样办法，这样以来生意搞的比较活了。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七年底两年净获纯利润三千六百元（银币）。一九三八年开始向外扩大采购业务，经理张廉轩亲赴苏州、杭州等地采购原茶，自己在苏州窰制（即熏制）花茶，成本大为降低。因黄河改道，黄河以东大部地区被日寇占领，往回运货困难，采取从苏州发货第一步运到商丘转亳州义利成茶庄（系义利成原分号）代转界首、周口运回许昌。这条路线运转条件较好，所购之茶都得以顺利运回。当时豫西一带，洛阳和南阳等地区，各茶庄和代销家均缺少花茶，这些地区大部分销茶是从许昌义利成购去的，因此购销不断扩大，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两年净获纯利润四万八千元。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年底净获利伍拾陆万余元（中央票）。这时王仙洲慌慌忙忙由原籍河北省冀县来到许昌，看到赚钱眼红，却忘掉当年义利成即将倒闭，恭手“让贤”之情景，背信弃义，提出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其目的是想自己经营。他的这种行为，激起了全体同仁的极大愤慨，我和张廉轩、宋敬堂、朱德甫等十六人，决计脱离义利成。当即着手清理帐目和在外地存货以及其它善后事宜。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份正式脱离义利成，开始组建新茶庄，取名“正义茶庄”，正义二字是同仁们伸张正义的内心反映。

正义茶庄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正式开业。营业地址设在许昌南大街中间路东，共有资金十八万元，入股者十二人，从业人员共十八人，由张廉轩任经理，我任付经理，宋敬堂、朱德甫为协理。在开业前夕，我们联合署名向各地老往来户和知友发出函告，概括阐述脱离义利成的经过，均得到同情和支持。

正义茶庄开业以后，一直是时起时伏的状况。一九四二年遇

到严重旱灾，生意萧条，再加上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重，上半年每日销售款仅够大家吃饭，有时甚至不足。但是我们并不气馁，有一个共同信念，“正义茶庄”是倒闭不了的，并提出要群策群力，开源节流，艰苦创业，共渡难关。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理张廉轩仍亲赴苏、杭等地采购，以备灾情过后的货源。下半年生意逐渐好转，年终结算，少有盈余，大家情绪更为高涨。

一九四四年正准备赴苏杭等地采购之际，日寇侵占许昌，采购计划落空，生意大为下降，再度亏损。尽管如此，在现有存贷的基础上，加强了向外地推销，并增加推销人员，扩大销售，减少了亏损。

一九四五年春生意仍然萧条，所有库存接近销空，资金周转不灵，面临此种情况怎么办？经过大家共同商讨一致认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此刻绝不能徘徊不前，张廉轩毅然决定亲赴苏杭等地向老往来业务关系陈述我方暂时困难，进行求援。到达苏杭后受到各茶厂家热情接待并给予很大的帮助，顺利地完 成 购 茶 计 划。开始往回运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廉轩迅速将货运往开封转回许昌，生意大有起色，正义茶庄再度转亏为盈，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两年是正义茶庄最兴盛时期。

一九四八年（四七年销售量火，库存货少），赴苏杭两地采购，当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国民党政府末日即将来临，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心惶惶，新茶上市后，收购者很少，价格非常低廉，茉莉花上市后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所购及窖制的花茶，不仅成本低，而且质量高，数量也大（仅高级茉莉花茶就近百担）。

许昌解放后，正义茶庄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各项方

针、政策，响应一切号召，遵纪守法，积极交纳国税，努力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得到党和政府的多方支持，于一九五六年走向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正义茶庄”这个字号被保留下来，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被取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河南省茶叶公司委托市糖烟酒公司南街商店批发部开展茶叶批发业务，并设零售茶叶专柜。由于市政府和公司的重视，于一九八六年元月“正义茶庄”又获新生。开业近两年来，各种茶叶质量考究，赢得信誉，受到顾客的好评，一九八六年比八五年营业额翻两番。从今年销售情况看，预计比八六年上升50%，预计批发可能上升30%。上述情况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喝茶人越来越多，茶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之一。展望茶叶前景，大有可观。

几十年来，“正义茶庄”历尽坎坷，几经起伏。从筹建到站住脚，从旧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业到解放后走上公私合营康庄大道，从“十年动乱”被取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而复生的过程，也正是自己几十年茶叶生涯的历史写照。

积自己几十年茶叶经营之经验，我深深体会到茶叶业务是有学问的，要精通更不容易。首先，茶叶品种多，产地遍布我国十几个省、几十个地区，色泽、条形、茶味各不相同，红、绿、花茶三大类别各有特色。其次，茶叶季节性强，有明前茶、雨前茶、夏茶、秋茶之分，不同季节的茶，货色不同，色泽味道各异，仅花茶就有茉莉花茶、珠兰花茶、玉兰花茶之分，茉莉花茶又有春、伏、秋花之别。再次，茶叶的窰制拼配技术复杂，各类茶叶货色各异，拼配不好，就会影响茶的色泽和香味。

在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今天，我深知自己对茶叶的知识还不够，我虽年逾古稀，但被今日的大好形势所激励，心情舒畅，在我有生之年，还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学习，来丰富自己关于茶叶的知识，为社会主义商业贡献余力。

1987年11月 3 日

李文甫烈士传略

整理人：沈世昌

李文甫（1895—1932年），又名李学俊，李小波。许昌市魏都区丁庄乡碾上村人。他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种地为生。文甫是孤子，从小热爱劳动。他自幼聪颖，喜爱读书上进。外祖母力劝其父送子进校念书。14岁时，才进入本村私塾学堂读书。五年后，又到付家齐私塾房拜师攻读“五经”、“四书”。经过两年多的刻苦研读，大、小楷写得端正有力，文采之茂已为村中之魁。

1916年秋，文甫考入河南省立许昌第四中学。在校期间，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探求真理。旧制中学四年毕业，他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为此师生列队，敲锣打鼓，鸣炮家门（三眼冲），向家长贺喜。众邻里兴奋异常，相互称道：文甫是咱村的大学问家啦！

1920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胸怀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到碾上小学任教。在校与教师张景良相互友好，密切合作。一面钻研教学，精心培育治国之才，一面致力于私塾改良。为了向师生宣传革命思想，他省吃俭用，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书。在李文甫和一些倾向进步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新思潮很快在碾上小学得以传播，文甫的威望也日益提高。

1926年李文甫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中共河南省委与许昌中心县委的通讯联络工作。他除出色地完成教学工作外，经常将上级党的指示、信件等，安全及时地送交县委领导。同时，他还参加党的重要会议。1927年3月，李文甫以代表身份出席在碾上村召开的中共许昌县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根据廖仲恺参与制定的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精神，与县委负责人李杜、陈云登以及薛朝立、张兆梅、张梦梅等人展开热烈讨论，以民主方法选定各乡农协的负责人，同时对党的建设、发展党员问题作了研究。会后，按照决议，李文甫让爱人依照他设计绘制的图案，赶制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七面。他还深入村上的“红学会”（即红枪会），向会员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团结奋斗，迎接北伐，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

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挽救革命，召开了“八七”会议。在白色恐怖下，李文甫没有犹豫、动摇，而是积极设法与省委取得联系，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然后根据上级指示，及时向县委书记李杜及陈云登同志传达汇报。县委遵循省委指示把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后，迅速扩大农运、工运、学运。掌握武器，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攻打县城，举行武装暴动。李杜、陈云登、薛朝立等深入许昌县司堂、杜寨一带，于1928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原的农民暴动，杀死了恶霸劣绅余金池等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地形不利等受挫，但显示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威力。

暴动失利后，李文甫坚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毫不动摇，继续为党工作。他和党员吴明杰在小薛庄小学发展梁文彬等两名学生入党，并兼任支部书记，继续开展党的活动。文甫擅长书法、绘画、赋诗，夜间他在煤油灯下，秘密绘制农协、农暴旗样，绘成后密藏在家中西屋内夹山墙洞里，直到他

牺牲后多年，家人才发现。同时，他借给乡邻写春联之机，揭露军阀控制的黑暗社会：“人不欺压自欺压，国不灭亡自灭亡”。春联贴出后，被国民党的一个连长发现，责问是谁写的。乡亲们机敏的回答是买的，才免遭横祸。

1931年至1932年，李文甫不断地领取省委指示，及时传达给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刘晋（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保证了许昌地下党组织与河南省委的联系。

1932年7月，因叛徒出卖，河南省委遭破坏，李文甫不幸被捕，押送至开封第一监狱。脚镣手拷在身，日夜鞭打拷问，受尽摧残。李文甫始终坚贞不屈，未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没出卖一个同志，保持了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的高贵气节。1932年8月20日，李文甫被杀害于开封西门外。

当时全省各地党组织多遭严重破坏，唯许昌中心县委所领导的各个组织，无受到任何损失，这是与李文甫同志严守党的机密分不开的。1933年1月，党中央派吕文远同志（当时名吕亚英）从上海来许昌，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与刘晋同志重新组建了中共河南省工委，迅速恢复了河南省各地党的组织，党的活动又继续开展起来。

1987年8月15日

鄭發 河南許昌人

1938年來重慶 去見蔣介石

当即拘押在白公館 與我同住一房

以其自言是蔣介石的親兄 我

由白公館出來時 他給我這張照片

這是蔣介石的一件重要的秘密事情

蔣其遠呈交

1963.6.30.



此相片系鄭發1941年去重慶找蔣介石認胞弟時所照。是時贈送給蔣其遠（1903—1983年，原國民黨少將師長。1938年被軍統拘禁于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1946年7月戴笠摔死后釋放出獄。1983年病逝。）留念。解放后蔣把此照獻給政府。蔣其遠附言“1938”實系“1941”之誤。原件現存重慶檔案館。——編者注

关于郑发找蒋介石认亲的前前后后

——蒋介石家世传闻调查记

李耕五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还是河南许昌人，众说不一，这是浙江、河南两省文史部门有争议而又关注的问题。两种说法孰是谁非，至今无法定论。曾有人倡议浙江、河南两省文史部门召开座谈会讨论此事，但由于涉及问题较为复杂，又怕讨论起来，各持己见，不好统一，因此未能落实。1984年8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又共同商议，以浙江省政协为牵头单位，共同搜集有关蒋氏史料，准备编辑出版一本有助于对蒋氏家世研究考证的书籍——《关于蒋介石的出身、家庭、家族、姻亲》一书，但由于各种原因，该书至今没见问世。

蒋介石是河南许昌人，郑发是蒋介石的亲哥哥，1941年郑发去重庆找蒋、蒋不认等说法，解放前在许昌就纷纷传说。解放后各种传闻流传更广。五十年代末，唐人所著《金陵春梦》一书出版，这传闻一时风靡全国，甚至飘洋过海。《金》书所写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情况，大致和许昌当地传说相似。只是作者在写书时身居海外，未能到实地作详细察考，错把其家乡许昌县的河街写成了临颖县的“繁城”（汉献帝刘协与魏文帝曹丕禅让处）。河街，在许昌城西北十二里；繁城，在许昌城西南三十里。两者

相距四十余里，又分属两个县，可谓“张冠李戴”了。1981年4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载张仲鲁、李延朗等所写的三篇“关于蒋介石家世传闻”的文章，也都和当地传说相同。此书传到浙江省后，引起有关史志部门的不同反响。为了弄清事实真像，还有人专程到奉化县溪口镇作了详细考察。1982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中刊载了何国涛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笔者到奉化访问了许多老人，并查阅蒋氏、王氏家谱，证实了“蒋介石系河南许昌人之说”纯属子虚乌有。1983年3月，民革中央《团结报》也登了这一消息，该报还赞扬了该文考察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指责了《金陵春梦》的失实。1985年，美国旧金山源流出版社出版的《源流》杂志第一期发表钟和先生《为蒋介石先生考证家世》的文章，再次证实唐人小说“郑三发子”之谈的错误。在此之前，还有人在海外其他报刊发表文章抨击唐人所写之“郑三发子”是“纯属捏造”，并且还在唐人的名下加上“之流”的污秽言词。那么，蒋介石到底是哪里人？唐人先生的《金陵春梦》所写之“郑三发子”是“纯属捏造”和“子虚乌有”吗？在省文史部门及许昌地、市、县有关领导的关怀与指导下，我对此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分几个部分综述于次：

一、《金陵春梦》及其“郑三发子”

1985年初，民革中央《团结报》发表了沈醉的文章《郑绍发确有其人》，文中介绍了郑绍发1941年去重庆找蒋介石认亲的经过。它不仅证明了郑绍发找蒋认亲实有其人其事，也证明了《金

陵春梦》所写之“郑三发子”并非虚构。《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以写现代历史小说著称，也可以说，他是专门为蒋介石写传的。因此他在写《金陵春梦》第一集蒋介石的小出身时，即以《郑三发子》为卷名。1981年4月严庆澍（唐人）先生给笔者来信说：“五十年代初，我奉命写《金》书，曾查阅了大量有关蒋介石的正史、野史、甚至是歪史等，书中所写的一些人物及其重大事件，都是有史据可查的。”严的儿子“唐小三”在1980年《新闻战线》第六期的《〈金陵春梦〉·爸爸·我》一文中也说：“为了写《金》书，爸爸研究有关蒋介石的各式各样的出版物，堆积如小丘，光是书籍就逾五六百本之多，为了查一个名子或一个年份，他可以连追几个通宵”等等。唐人1980年发表在《十月》杂志第二期上的《〈金陵春梦〉及其它》一文中自述其创作时说：“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落叶归根’，并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这五页八行笺就是当年郑发去重庆找蒋认胞弟的真实记录。唐人又说，当他得到这些材料时，开始并不相信蒋介石会有这样一段传奇式的故事，也不相信侍卫官所写是实。后来又将蒋介石的家谱、浙江地方志和蒋介石的传记等逐一核对，再对照蒋的发迹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才深信这个侍卫官所述并没有“耸人听闻”之处。于是就按蒋出身之真实历史动笔写《金》书第一集《郑三发子》。从以上所说来看，严写郑三发子，并非“纯属于虚乌有的海外奇谈”。香港报人费彝民在《金》书第一集《郑三发子》序文中曾指出：“《金陵春梦》不但生动活泼，刻画入微，它的真实性，尤其值得推崇和信赖”。

自唐人小说《金陵春梦》出版以后，“蒋介石本姓郑，小名三发子，是河南许昌人”之说，很快风传海内外。国内出版的一些书籍报刊，也时而见到有人发表文章，证实《金陵春梦》所写是实。

1963年4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刊载黄彤光的《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一文也证实了《金》书所写的真实性。他在文中写道：“郑老头子（指郑发、该文作者语）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生哥哥。他是在1944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接来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子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子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子认为老三既已发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儿俩又送来了。她（郑老婆子）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牲’，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有一年多，又派人把他们送走了，去处不详。”在此之前，全协196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刊载另一篇《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的文章，也谈了上述情况。该文作者李任夫自1941至1946年先后在重庆、息烽两个集中营关押并工作四年之久。文中说：“蒋介石的胞兄郑绍发，

这个神话性的人物，只要你一见面，就可以肯定确是蒋介石的同胞弟兄。他自1941年从河南跑到重庆来找蒋介石，不特没有会见，反而被扣，先拘禁在重庆的白公馆，曾与我同住过。以后为保守秘密，又转送息营……反动派为照顾郑的一切，除衣食住优待外，初次即为其寄二百元回家，以后每月还代他寄几十元。从这点看，可能出于蒋介石的指示，不过为自己的面子，不便与之相见而已。”群众出版社1980年出版陈少校所著《黑网录》一书中的174页也说：“在息烽集中营里，还住着一些与政治犯无关的人。比方一个郑老头，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郑老头是蒋介石的胞兄，名叫郑绍发。样子长得和蒋介石一模一样，如果两个人站在一起，谁都会认出他们是一对兄弟。他在1941年从河南跑到重庆要见蒋介石，不但见不到，而且立刻被戴笠扣留起来，亲加审讯。这老头字字吐实，连相貌都可以为他作证明。蒋介石一向吹嘘四维八德，而且‘事亲至孝’，自然不好下令戴笠把他杀掉；蒋不开声，戴也不敢乱动，只好‘优待’起来。先在重庆，后来才转到息烽。初去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之后，又从河南乡间，把他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一起弄了过来同住。特务在息烽集中营内另外建了一栋房子，把他们安置在内，每月给以特别津贴，由他们自办伙食。据郑绍发的老婆说：郑老头与蒋介石确属同胞兄弟，郑老头行大，蒋介石是老三。”

1982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沈醉、文强所著《戴笠其人》一书的111页中提及当年曾经在重庆闹得满城风雨的一件新闻，沈醉写道：“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堂到蒋家当‘拖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

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性的乡下土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象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亲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到磁器口缫丝厂，不准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去，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另外，1985年4月重庆出版的《人世间》创刊号杂志所载《韩子栋两遇郑大发子》一文，也以上述说法，谈了郑发在集中营所处之情况。

除上述书刊著文之外，近年来在敌伪档案中还发现一些有关郑发找蒋的史料文字以及郑发写给蒋介石的信函。

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南京出版的《民国春秋》杂志第二期，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秋颖的《郑发与蒋介石似有隐情》一文中说：“1946年夏，郑发从重庆回到许昌后，因始终未见到蒋介石，‘殊觉怅然’。同年冬，他又从河南来到了南京，住在‘昇州路糯米巷15号’。因‘晋谒无门’，于12月中旬又寄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一封信，其主要内容如下：

‘窃郑发年六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廿五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